

“Vessels carry the way” - a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 of schola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y

Haiyue Sun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y is the materialized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scholars. It is far more than a practical place for writing and creation; it is a core cultural symbol that embodies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showcases the aesthetic concepts of the East. The arrangement of stationery is by no means a casual act; rather, it is a meticulous creation by scholars to express their aspirations through objects. From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brush, ink, paper and inkstone to the spiritual solace of refined display and elegant play, each object carries profound symbolic meanings, jointly piecing together a “materialized picture” of the inner spirit of scholars. In addition to realizing their practical value, these artifacts have been elevated to become a medium for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observing the essence of the Dao, thus enabling the study space to transcend its physical limitations and reach a spiritual realm of “the integration of Dao and artifacts”.

Keywords

Stationery tools; Using tools to convey messages; Literati spirit; cultural connotation

“器以载道”——中国传统文房的文人精神映射

孙海悦

天津美术学院, 中国·天津 300000

摘要

中国传统文房是文人精神世界的物化呈现,它远不止于进行书写创作的实用场所,更是凝结了千年文化基因、彰显东方美学理念的核心文化符号。文房器物的陈设绝非随意之举,而是文人“托物言志”的精心营造。从笔墨纸砚的道德喻示,到清供雅玩的心灵安顿,每一件器物都负载着深厚的象征意涵,共同拼合出文人内在精神的“物化图景”。这些器物在实现实用价值之余,更升华为人格修持、观照体道的媒介,从而使文房空间超越了其物理局限,臻于“道器相融”的灵性境界。

关键词

文房器具; 器以载道; 文人精神; 文化内涵

1 引言

“器以载道”这一观念所蕴含的象征美学,不仅呈露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审美智慧,也深刻揭示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内在联结,为当代人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关键的美学路径。本文以中国传统文房器具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其“器以载道”特质所包裹的文人精神寄托。从笔墨纸砚到各类文房清玩,通过解读其物质形态背后的文化密码,不仅能够挖掘传统文明的深层底蕴,亦可在当前快节奏、物质化的社会语境中,重寻那种渐已稀薄的精神持守与文化自觉。

2 文房器物

文化常被视为抽象而难以把握,然而真切体现往往依

赖于具体的物态载体,而非悬置于空泛的理论。就器物而言,其造型、功能与工艺无不渗透着文化的气息。功能、造型与工艺的差异,进一步塑造了器物各异的文化内蕴。只要器物存世,无论历时多久,文化便得以持续彰显。缺乏载体,文化亦将无所依附。现今博物馆中所藏出土或传世文物,其造型工艺具象而微,无一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讯息。因此,书斋的一项重要功能,即是通过器物的汇聚以集约文化,借助器物以展示与传递文明。器物是文明的代言,是文化的传导,对器物的认知与体验,亦即对文化本身的深度探寻。

2.1 笔

居文房四宝之首,是文人书写与创作的核心工具。从其雏形阶段的简易竹笔,逐步演进为制作精良、品类丰富的毛笔。依毫料划分,毛笔主要有羊毫、狼毫与兼毫等类别。羊毫笔性柔润,蓄墨充沛,适于楷书、隶书及工笔绘画,能呈现丰腴柔和的线质;狼毫弹性佳健,锋颖锐利,多用于行草书及绘画勾勒,可展现刚健劲挺的笔触效果;兼毫则融合

【作者简介】孙海悦(1998-),女,中国黑龙江黑河人,硕士,从事室内陈设美学研究。

二者特性，刚柔相济，适用范畴更为宽泛。除毫料之别，笔杆制作亦极尽考究，常见竹质、木质，亦不乏象牙、犀角、玉石等珍材制成的笔杆，其上常雕饰以花鸟、山水、人物等精美纹样，令其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鉴赏价值。

笔：文人风骨的象征。笔在文人生活中占有至高地位，它不单是书写工具，更是文人风骨的象征。毛笔的制作深蕴哲学智慧，硬毫与软毫通过精妙配比制成兼毫，体现了刚柔互济的传统思想。

毛笔虽身形小巧，却维系着中国文人绵延千年的精神脉络与气节传承。那挺括不屈的笔杆，是文人“守节不渝”的风骨具象；兼具刚柔特质的笔毫，暗藏着“能屈能伸”的处世哲学；而笔锋所到之处，更彰显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从唐代颜真卿持狼毫挥毫，将忠烈情怀凝于笔端；到宋代苏轼执羊毫落墨，以豁达心境融入笔墨；从司马迁忍辱执笔记史，以“立言”坚守文化使命；到东汉班超弃笔从戎，于西域立下赫赫功勋——毛笔始终与文人的精神轨迹深度交融，它早已超越单纯的书写工具属性，成为串联物质与精神、勾连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纽带。

在当代语境下，尽管毛笔的使用频率逐渐式微，但其承载的气节观念与文化象征却愈发显示出超越时代的价值。它提示现代人应秉持笔杆般刚正不阿的品格与笔毫般灵活应变的能力，更应以“担当”为笔，以“坚守”为墨，在新时代的文化图景中书写具有当代性的气节话语。毛笔因而由一种物质性器具升华为一种精神性符号，为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构建文化认同提供深远的思想资源。

2.2 墨

墨为书写绘画之色料。墨之妙用，质取其轻，烟取其清，嗅之无香，磨之无声，若晋、唐、宋、元书画，皆传数百年，墨色如漆，神气完好，此佳墨之效也。唐代制墨名家奚超、奚廷珪父子所制佳墨，得南唐后主李煜赏识，赐予国姓“李”，自此“李墨”誉满天下。至宋代，因李墨产自歙县，该地改称徽州，“李墨”亦易名为“徽墨”。早在商周以前，墨作为黑色颜料已用于书写，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出土墨块，为迄今所见最早实物。汉代制墨业已具规模，东汉发明墨模，三国韦诞制“仲将墨”声名卓著。唐代此业兴盛，奚氏父子迁居歙州制墨，南唐后主赐姓封官，“李廷圭墨”由此扬名。宋徽宗时歙州更名为徽州，制墨呈现“家传户习”之盛况，明清时期徽州始终为制墨中心。古人谓：“新墨总不及旧墨。”新墨初成，色泽虽亮，却未经时光沉淀，光浮而质不沉。旧墨历经岁月滋养，胶质渐褪，层次愈发清晰，下笔流畅，墨韵更显醇厚。

墨研磨心智。研墨乃调适身心的过程，唯有心静气和，徐徐研磨，方能得佳墨。同时，研墨可活络手腕，增强腕力。无论制墨者还是用墨者，皆须心静制墨、研墨，继而宁神书写。制墨者心不静，则所烧烟料含杂，墨质不佳，且损砚石；研墨者心不静，则墨粒粗疏不匀，书写绘画时墨韵缺失或浑

浊暗淡，气韵不通。苏轼曾言：“非人磨墨，乃墨磨人。”意指藉由研墨平息心绪，涵养性情，方能进入书画创作的最佳状态，诞生佳作。今人以墨汁替代研墨，省略了调心之序，亦是追求速效便捷之果。

2.3 纸

纸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两千年前，人们在石头、甲骨、竹简、木牍、绢帛上书写、雕刻文字，传承祖先的经验，文明的曙光初现，微弱而渺茫。纸出现之后，书写材料变得简单，取材方便且价格低廉，文化的传播范围扩大，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1]

宣纸乃中国特有之手工艺珍品，以质地柔韧、光洁如玉、防蛀耐腐、墨韵万千而著称，享有“纸寿千年”之誉，被视为“国宝”。以宣纸书画，墨韵分明，层次丰富，骨力内含，神采外溢，此外，宣纸令人惊叹的耐久性使其成为传承文化的关键载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文学典籍正是依靠宣纸得以完好保存千年之久，如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顾恺之的精妙绘画等，皆是借助纸张跨越时空的限制，将古人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瑰宝传递至今。文人在宣纸上挥毫泼墨，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肆意抒发，更是对文化传承的庄重担当，宣纸的“承载”特性，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文人“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感。

文人胸怀的承载。纸与文人的品格追求纸张的纯白素净，恰似文人对高尚人格的执着求索。从其制作原料观之，无论是竹、树皮抑或其他植物纤维，均需经过反复清洗、蒸煮、曝晒等工序，剔除杂质，方成洁白之纸，此过程隐喻着文人在成长中持续地进行自我净化与提升，摒弃不良习气与观念，追求内心的澄明与崇高。

2.4 砚

砚台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是文房四宝之一，更是历代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雅物。其以独特质料、精湛工艺、深厚文化内蕴和鲜明地域特色，成为书法艺术的关键载体，承载着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精华。砚台伴随文人读书、写作、创作，见证其人生起伏、情感波折。文人在砚台铭刻诗词、题记，记录人生感悟、情感经历。如一方传为苏轼使用过的端砚，砚上铭文蕴含他对人生的思考与豁达心境，后人通过铭文，能感受到苏轼当时情感，砚台成为跨越时空传递情感的纽带。

文人坚守的象征。砚台的静默持久之性，亦折射出道家清静无为的哲学理念。研磨之际，文人须凝神定志、心无旁骛，墨与砚相磨之声、墨香渐散之韵，皆有助于摒除杂念，达至“澄怀悟道”之境，正与道家所倡“虚静合道、顺应自然”的境界相契合。与此同时，砚台质坚耐久，可跨越千年而不朽，其近乎“永恒”的物质性，象征了“道”之永存纵使岁月流转、人世变迁，砚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哲学内核始终如一，成为一种连贯古今的精神媒介。后人于研墨赏砚之间，仍可体味传统哲学中深远不变的意蕴。

3 文房清供

文房清供是文人书斋中一切文化用具及陈设的总称。

“文房”之名，大约始于南北朝时期，《梁书·江革传》记载“此段雍府秒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驎于千里。”^[1]广义上，主要指供文人读书写字等的场所，即指文人的书斋，是阅读、工作、休憩的地方。狭义上，多指“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以及其衍生出的辅助用具。如笔筒、笔洗、笔舔、水注、水砚滴、砚屏、印盒等。之后文房体系发展不断发展，至晚明时期已日益完善并逐渐达到高潮。

“清供”一词亦从宋代流行至今。《辞源》将“清供”释为“清雅的贡品”。清供最初大多为佛前贡品，以香、花、瓜、蔬代替牲畜，在后期发展为包括金石在内的一切可供案头赏玩的文物雅品。秦汉时期，清供意味开始显现在书斋陈

设上，如瓶花、盆景、金石、书画、乐器等。房内有一些器物看似用来摆设欣赏，其实是在欣赏之时借以调心理性，陶冶性情，如供石、瓶花、盆玩、熏香等皆是如此。这些在古代都是书房里的必备内容，书房就是靠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器物来调节氛围，调整人的状态，形成传统书房独特的韵致。随着当时社会文人地位和审美情趣的提高，清供逐渐变成了文人逸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清供器物的发展到了汉唐时期已经趋于完备，于唐宋时期兴盛。

如此“文房清供”即指包含文房用具在内，摆放或陈设在书案上的可供赏玩的物件。明清时期是文房清供发展的高峰期，“文房清供”还被称之为“斋中清供”或“文房雅玩”。这时器物在材质、造型和装饰上都极为丰富，并随着文房生活日益精致化，文房器具的功能也由实用性向陈设性和工艺性转变。^[3]



图 1

4 文房清供映射的精神内涵

文房清供不仅构成传统文人生活的物质环境，更成为其精神修行的媒介与人格理想的外化。这一实践的核心在于“以物喻人”文人通过对器物的选择、使用与陈设，具象地表达其对君子品格的追求与儒家“修身”理念的践行。器物由此转化为一种“人格镜像”，超越了实用功能，承载了深厚的道德与审美内涵。在“尚雅反俗”中彰显人格独立。文人集团在清供审美中表现出对奢华材质的疏离，金玉之器常被视作“俗物”，而竹木、陶瓦等朴素材质反而备受推崇。这种“重雅轻奢”的取向，实质是对功利价值观的抵抗。文人借器物之简素，喻示自身不为外物所役的精神境界，强调人格的自主性与纯粹性。明代文徵明曾以“竹榻一张、素瓷笔洗一方、旧砚一方”自述其书斋陈设，并谓“足以安身、足以悦心”，正是通过器物的物质之简，折射出主体精神的清高与自足。

5 结语

文房器物的陈设美学是中国传统文人生活哲学与审美理想的结晶，不仅构筑了传统书斋的雅致空间，更承载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清逸高洁的文人精神。

文房器物陈设既能赋予现代空间以文化厚度，亦可唤醒人们对慢生活与雅文化的向往，为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开辟新径。未来，随着对传统美学精髓的深入发掘，文房器物陈设美学必将在更广阔的现代空间中焕发光彩，成为连贯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康小兵主编.文房雅器[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2.
- [2] 长物志/〔明〕文震亨撰；胡天寿译注.一重庆出版社，2017.4（2023.12重印）ISBN 978-7-229-11476-3
- [3] 斯文在兹：中国传统书房文化与器物研究/子川著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03-1368-7